

趙慶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歷史敘事 (narrative) 與歷史解釋 (interpretation) 原是史學編纂的兩大要素，中西古代史家均有悠久而良好的敘事傳統，敘事體的歷史學，在科學體史學出現前，曾掌握了長時期的史學編纂權，但十九世紀以降，科學主義勃興，歷史學的科學化，消解了史學與修辭、文學之間千餘年來的聯繫，是敘事史學 (narrative history) 沒落，分析史學 (analytical history) 興起的關鍵，分析史學強調史學的科學性，重解釋，輕敘事，崇尚真實、精確，使歷史寫作中的藝術性與文學性大受貶損，如此風潮橫貫整個二十世紀。

爾近，部分思想家開始有不同想法，認為史學不能建立如自然科學般的真理 (或定律)，因為歷史不像物體有一定規律的運動，但歷史的趨勢可以找尋，歷史也沒有最後的解釋 (final interpretation)，不能遵守科學的規律，不能將決定論應用到歷史，這些論述有助於促成史學界重新重視敘事。本文即以敘事的核心理念為論述重點，說明史學編纂如何在二十世紀中葉，重新重視敘事的優位，並思考此一轉向對大眾文化與歷史教學可能產生的影響，以供課程規劃及教學實踐參考。

關鍵字：敘事、敘事史學、分析史學

Email : t0345@ntua.edu.tw

收件日期：2018 年 08 月 21 日；修改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壹、前言

「回歸敘事」是近來史學運動最重要的轉變，歷史學重新與文學、藝術結合，恢復敘事傳統，其生動與可親性，產生深遠的影響。人類在文字發明之前及文字使用初期，曾有漫長的口語傳播經驗，文明的開展靠口語敘述，東西文明的發展十分相似，孔子和蘇格拉底都是「述而不作」，蘇格拉底更是堅持口語的陳述方式較能展現明晰性，有助於界定真理，他主張真理是要「聽取」，而不是「讀取」的（Steven Roger Ficher 原著，李中文譯），在蘇格拉底或孔子的時代，因文字的表意功能尚未周全，在那原始的書寫活動裡，容許太多的模稜兩可，而妨礙了溝通，有教養又詮釋能力佳的閱讀者又十分難求，這是為何他們獨鍾口語敘事的原由。

不僅如此，敘事的功能不只是爭取表意的周全而已，而且更能發揮情感的陶冶作用，蘇格拉底認為真理是寫在聽者的靈魂上，使他能夠得知真、善和美的事情，號稱「整個古代希臘人培養下一代人格的訓練場」的荷馬史詩，若非用優美的抒情詩型式，和天馬行空的神話故事體，其影響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也必須在各個城市巡迴吟詠自己的作品，後來形成慣例，每逢奧林匹克節慶，就唸給所有前來集會的男士聽（Steven Roger Ficher 原著，李中文譯），畢竟有溫度情感的敘事方式，相較於冰冷的文字說理，更能引起共鳴。

敘事體的歷史學，在科學體史學出現前，曾掌握了長時期的史學編纂權，但十九世紀以降，科學主義勃興，歷史學的科學化，消解了史學與修辭、文學之間千餘年來的聯繫，是敘事史學沒落，分析史學興起的關鍵，分析史學強調史學的科學性，重解釋，輕敘事，崇尚真實、精確，使歷史寫作中的藝術性與文學性大受貶損，如此風潮橫貫整個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末敘事史學的復興主要是由文學界的學者領導，從語意學的研究（亦可稱之為語言學的轉向），發現所謂歷史真實內涵中的虛構性，從而主張「回歸敘事」，認為歷史寫作需要更多的文學性而非科學，史學作品須透過想像過程處理，其「詩性」、「修辭性」要強過科學性與概念性。敘事史學的主要闡述者有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安克斯密特（F.Ankersmit）以及呼籲「敘事史學復興」的著名史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當然，分析史學與敘事史學之爭目前仍在進行中，其優劣利弊互現，敘事史學的相關論述在史學界也未盡獲得認同，但對其衝擊與啟發，卻是有目共睹。

敘事主義的歷史學在 20 世紀 70 年代興起之後，已蔚成風氣，本文將論述在敘事史學的影響下，歷史編纂中的許多特質，如何被重新思考和界定，敘事

史學對史學界雖有重大影響，但對教育學的研究，卻未產生具體的影響，除了「心理傳記學」對心理學研究領域有啟發外（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近幾年來，致力於此一趨勢的研究發展），對教育哲學、課程規劃與教材教法，均未見有實踐性的具體貢獻，在國內也未有相關的研究論文問世，此為筆者不揣淺陋，冀望拋磚引玉之目的所在，希望經由此一方向的探討，對大學歷史教學的理論探討與課程規劃有所貢獻，尤其是通識歷史課程，因為修習者均非歷史本科，敘事史學所強調的藝術與文學性，更能貼近生活，吸引力更大，敘事史學強調故事，歷史敘述經由故事體，增加了文學的可親性，使歷史不再是呆板的「斷簡殘篇」，將更能吸引學生；至於由敘事所延伸出來的多重觀點（multiple perspective），以及敘事式歷史必得與歷史寫作結合，都可在規劃通識歷史課程時，激發出新的構想；敘事形式能夠輕易跨越虛構與真實之間的疆界，而使史學與文學、藝術作更深刻的結合，這種開放疆界的做法，使我們所謂的跨領域整合有了新的界定，尤其筆者任教的是藝術大學，更與敘事史學的藝文屬性有較大的相關，這也是本文企圖探討的旨趣所在。

貳、科學主義與分析史學的全盛

「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英國史家伯雷（J.B.Bury）。」

分析史學與敘事史學所強調的最大歧異點是：「解釋」與「敘事」何者為史學編纂的重點，這又涉及史學是科學或是藝術之爭，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科學與理性成為知識界的指標，十九世紀西方史學大盛，名家輩出，蘭克（L.von.Ranke）及追隨者運用新的科學方法處理史料，史料考證學大盛，形成二十世紀新史學運動的出現，帶領西方史學邁入黃金時代。

然而分析史學涉及撰史者必須要有思想觀點，最好有通則（generalization）否則不利於判斷、解釋。這種尋求通則的趨勢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又窄化成追尋定律（laws），普世定律的尋求使歷史學者成為樂觀的決定論（determinism）者，孔德（A.Comte）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一出，追隨者力持科學為獲得知識的唯一方法，應用於歷史學，可以得知其變化律，也可以預測未來事件的發展（杜維運，1999）。

孔德將人類歷史的演進分為神學、玄學、實證三階段，這種經由階段發展而止於至善的說法與馬克思的社會演進五階段的說法相似（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趙慶河，1995），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堅信歷史是科學，可以形成定律與預測，科學史學的地位至此屹立不搖。

科學史學興起是分析史學大盛而敘事史學衰退的關鍵，科學史學一向是捨（文學）敘事而就（科學）論證，英國史家伯雷（J.B.Bury）認為，只要史學尚滯留於藝術階段，則真實（truth）及精確（accuracy）會受到損害；法國史家古朗士（F. de Coulanges）也說：歷史非為消遣，直是科學（黃進興，2006）。二十世紀開始，科學史家挾史料考證及結合新興社會學科的優勢，而有新史學的出現，主要的有量化史、社會科學史、心理史，其間雖有新、舊之爭，但在科學的總攝之下，重分析，輕敘事，其趨勢至為明顯，離不開分析史學的範疇。分析史學越往精確、專題發展，越依賴統計表、口頭交談、社會模型（sociological models）、心理分析理論（psychoanalytic theories），所寫成的作品，文章風格不顯，缺乏動人情節，難得讀者欣賞（杜維運，1999），這種文、史殊途的作法，使史學編纂中的文學性與藝術性大為降低。

由於歷史的科學性與藝術性長期爭論不休，二十世紀中葉之後，事實上大多數的史家已同意史學編纂兼含科學和藝術，柯郎浦（C.G.Crump）即稱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是一個不必討論的問題，企圖自所見的事實建立有效的理論，自然憑藉科學法則（scientific principles），而要將此理論表達出來，則須靠藝術原理。羅素（B.Russell）也說：「關於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有很多爭論，在我心目中，多少是無謂。我想，它兼具二者，應為昭然若揭之事。」（杜維運，1999）雖然說是二者兼顧，但仍有主從之別，觀乎二十世紀的共產革命，馬克思尊為教主，唯物史觀被視為金科玉律、科學的真理，就知道分析史學的霸主風采了。

參、敘事史學的復興與衝擊

「沒有敘事，即沒有歷史—意大利史家克羅齊（B.Croce）。」

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原是史學編纂的兩大要素，中西古代史家均有悠久而良好的敘事傳統，中國史家「文史合一」，講求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冀望將史料考證能力、道德判斷力與撰述才能冶為一爐，因此，自司馬遷以降，許多史學家都是文采斐然的敘事高手；西方史家亦然，古希臘的史學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修昔底斯的（Thucydides），古羅馬的李維（Livy）、塔西陀（Tacitus），也多以敘事見長，敘事史學在極漫長的歷史中佔盡優勢，即使是在科學日漸滋長的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重要的史學家及其作品仍以敘事風格呈現。

十九世紀前後，史學大盛，具有開創地位的史學領導人蘭克、麥考萊、米其勒、吉朋，雖有撰史的新方法與觀點，但同時也都是敘事大師，蘭克即主張史學應兼具科學與藝術的雙重性格，意即：於研究的階段，史學應依循科學方

法；而於寫作的過程，史學則展現藝術的技巧（黃進興，2006）。這種主張原為公允之論，可惜隨著科學地位的提升，分析史學全盛，敘事史學衰落，成了「敘事的隱晦」（the eclipse of narrative）（黃進興，2006）。

史學家葛利（W.B.Gallie）認為，歷來的歷史哲學誤將「解釋」當作考察的重點，而忽略「歷史敘事」的重要性，他主張：每部真實的歷史作品皆是故事的亞類，唯一不同的是：歷史的敘事必須植基於證據之上（黃進興，2006）。

心理學家也從學理探討「敘事」在史家撰述中的地位，布魯納（E.Brunner）就認為敘事結構比隱喻、典範等相關觀念優越，因為敘事結構強調秩序與順序，比較適合於研究變化、生活周期或任何一種發展過程。他又區分了「邏輯科學思維」和「敘事思維」二種模式的不同，兩者都可以用來說服別人，前者以真理來說服人，後者則以其生動來說服人；前者最終訴諸於求證的程序，由此建立形式的、經驗的真理，後者建立的不是真理而是逼真（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2001）。這種說法與德國哲人狄爾泰（W.Dilthey）用「移情領會」（*verstehen*）來說明歷史撰述的態度可說是若合符節。歷史學家敏克（L.Mink）認為歷史的認知是「形貌的理解」，是一種形貌模式（*configurational mode*），與哲學的範疇模式（*categorical mode*）、自然科學的理論模式（*theoretical mode*）顯然不同（黃進興，2006）。史家不能建立如自然科學般的真理（或定律）也獲得許多學者的支持，頗柏（K.R.Popper）即不認為有所謂的歷史定律，因為歷史不像物體有一定規律的運動，但歷史的趨勢可以找尋，歷史也沒有最後的解釋，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也斷然認為歷史不能遵守科學的規律，將決定論應用到歷史也是不可能（杜維運，1999）。這些論述有助於促成史學界重新重視敘事。

二十世紀的新史學如計量史學、心理史學以及年鑑學派（Annals School），重分析輕敘事，喜用專題研究，時間色彩淡褪，故事性及文字的修辭性薄弱是很明顯的事實，這些分析史學派的學者刻意將史學作品向科學作品看齊，雖有其學術上的價值，但卻失掉一般民眾閱讀的可親性，成為史學家專寵的小眾閱讀，與史學明事變、知興替的大眾教育目標背道而馳。以年鑑學派的布勞岱爾（F.Braudel）的著作（如《地中海史》）而論，不但卷帙浩繁，只講結構不談事件和人物的方式也異於一般人的邏輯思考習慣，尤其是反敘事形式，更使讀者望而生畏。因此，有些歷史學家開始思考向敘事方向傾斜，由年鑑學派和心理史學衍生而出的心態史學就是一個例子，勒華拉杜里（E.Le Roy Ladurie）的《蒙太猶》（Montaillou），就是兼顧史料考證和敘事情節動人的史學著作，至於所謂的微觀史學（*micro-history*）、稠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都是回歸敘事的現象，難怪1979年史家勞倫斯·史東（L.Stone）要撰寫〈敘事的復興〉：

對於一種既新且舊史學的省思)一文,公開宣稱敘事史學復興的時代來臨了(黃進興,2006)。

肆、後現代主義與回歸敘事

「事實僅係語言的存在—羅蘭·巴特」;「歷史若文學—海登·懷特。」

二十世紀末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動,但因涉及文化的各個領域,由破而立,進而形成自身的一套理論,乍看之下,其破壞力十足,但因其目前尚在演進當中,利弊得失猶待觀察。

對傳統史學觀念而言,後現代主義者衝擊的力道很大,他們認為歷史上沒有真理,沒有客觀,沒有真實(reality),歷史是推論(discourse),是意識形態的化身,史學家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杜維運,1999)。這種歷史等於虛構的說法對傳統史學而言真是驚世駭俗。

使史學轉向的關鍵著作是海登·懷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Metahistory另譯《後設史學》)以及安克斯密特1983年的《敘事的邏輯:歷史學家語言語義學的分析》(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以及羅蘭·巴特的許多相關著作。羅蘭·巴特有兩步論點,第一,語言不能指涉語言外面的任何事物,因此,歷史紀撰只能訴諸敘事,以使其話語具有意義和說服力;第二,歷史借用了虛構中發展起來的敘事,歷史敘事最終與虛構敘事無法區分(盧波米爾·道勒齊爾,2004)。羅蘭·巴特和海登·懷特一樣,認為歷史與虛構無區別,歷史文本如同文學文本,歷史像現實主義小說一樣,「它們的」、「真實」來自精心的敘述,講究的章法,和大量的擴充(指具體細節)(盧波米爾·道勒齊爾,2004)。這種歷史虛構論屢見於整個後現代主義陣營,例如安克斯密特說:「從邏輯上說,敘事性解釋的性質是提議(proposals),它向我們表明,可以從何種視角來看待過去」(彭剛,2009);張伯斯(I.Chambers)說:「歷史到我們手中,已不是原始血淋淋的事實,而是文本的產品,根據意志(為真理)與企圖(為權力)以編織成的敘事」;詹京斯(K.Jenkin)說:「歷史是推論,一種語言遊戲」;司拜介耳(G.Spiegel)說:「如果『文本』(texts)...不能明顯的反映事實,歷史研究將與文學研究很少區別,『過去』也就溶入到文學裏面去了」(杜維運,1999)。這些論者除司拜介耳還有些商量的餘地外,其他幾乎都把歷史等於虛構視為公式,但也都一致認定「敘事」在史學編纂的重要地位,這也是海登·懷特倡言「回歸敘事」的背景。

後現代學術陣營中對敘事史學影響最大的是海登·懷特的《元史學》,在其中譯本的前言中,懷特宣稱:「近年來的「回歸敘事」表明,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地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

歷史學處理」；他又說：「特定歷史過程的特定歷史表現必須採用某種敘事化形式，這一傳統觀念表明，歷史編纂包含了一種不可迴避的詩學、修辭學的成分」；「這意味著（歷史應）回歸到隱喻、修辭和情節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論證的規則，而充當一種恰當的史學話語的成分」；「我認為，史學家尤其想通過將一系列歷史事件表現得具有敘事過程的形式和實質，以此對它們進行解釋」（海登·懷特，2004）。

懷特之所以拳拳強調歷史的文學性與敘事性，是因為他認為史學家用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這和科學的話語明顯不同（按：科學用語精確、直接、不用隱喻）；而且歷史知識是次級知識，它以對可能的研究對象進行假想性建構為基礎，這就需要由想像過程來處理，這些想像過程與文學的共同之處要遠甚於與任何科學的共同之處（海登·懷特，2004）。日常語言與想像過程決定了歷史的文學性，其運作方式更進一步強化，懷特認為語言的運作離不開比喻，所有的思想、意識，都是「對著經驗的『比喻』加工」，因此在敘述過去之前，已經隱藏著某種「先於認知和先於評斷」的形象比喻，這個階段是「詩歌」行為時期，歷史學家既創造他的分析對象，也預先決定他將用以解釋的概念策略樣式，因此不妨說，歷史學家決定用來賦予一組歷史事件以意義的情節編排類型，是由他已經用以描述內容的那種語言的主要隱喻方式決定的，然後才有它所作的敘事（盧波米爾·道勒齊爾，2004）。懷特隱喻的說法，也是他認為如此一來可為我們劃分歷史想像的各種深層結構，而其選擇方式是根據美學的、道德的，而非（科學）認識論的（海登·懷特，2004）。

在歷史編纂的過程中，懷特認為歷史事件按照次序排列成一種編年史，編年史轉換成故事，故事通過情節編排獲得某種意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便是歷史紀撰體裁的選擇，通過情節編排進行解釋的方式，相當於選擇「某種故事」：傳奇、悲劇、喜劇或諷刺文（盧波米爾·道勒齊爾，2004）。懷特列出四種情節化模式：浪漫式、悲劇式、喜劇式、諷刺式；四種論證模式：形式論、機械論、有機論、情境論；四種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無政府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海登·懷特，2004）。這三組模式類型可以用來分析歷史學者因不同思想、表現和解釋方式所形成的風格，它包含「論證」、「布局」、「意識形態」，而風格也是認知的、審美的與道德的，其文學性仍高於科學性；此外，懷特也將詩學的比喻理論用來分析歷史語言的深層結構，因而得出四種比喻的類型：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諷（irony）。他認為歷史的論述都是這四種比喻的作用（文學上稱之為轉義 trope），因此，史書會呈現出和詩、小說、戲劇同樣的語藝模式（海登·懷特，2004）。被後現代主義學者高舉且招來眾多爭議的「歷史若文學」的主張就是在這樣的

思考下出現；不過，對於懷特的論點，安克斯密特有些支持性的補充，他把歷史學家對於諸多陳述的選擇和編排的態度稱之為史家的「政治」，而史學技藝的高下是「歷史表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貫穿審美、政治和歷史三個不同領域；他認為很多人反對歷史文本所具有的文學性，認為文學是虛構，不具認識的功能，其實這種看法不對，文學和歷史同樣具有認識實在世界的功能（彭剛，2009），國內學者薩孟武對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所寫的歷史析論，史事、年代雖屬虛構，但卻有真實的歷史感受，似乎可以印證懷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若干論點。

伍、敘事史學對歷史課程與教學的啟發

敘事史學雖然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而再受重視，但後現代主義者對史學的主張卻廣受史學界的批評，希姆法（G. Himmelfarb）說：後現代主義，稱美歧異，不連貫，不均衡，反面，不調和，不確定，曖昧，諷刺，似是而非，邪惡，愚蒙，隱晦，訛誤，混亂。……歷史理性、和諧、一致、徵實的觀念，皆予揚棄（杜維運，1999）。對於史學界最無法接受的是歷史虛構論，如果歷史真的全屬虛構，那麼整個歷史學門不就不能存在？

不過，後現代學者對於史學發展的利弊本文暫且不論，他們對於敘事的重視卻也啟發了歷史課程與教學的規劃（尤其是歷史通識課程）。以下就是從幾個通識教育的觀點申論之：

一、故事體

如果從字面上對照，可看出歷史與故事的相關：history—story（英文）、histoire—histoire（法文）、geschichte—geschichte（德文）、storia—storia（意文）、historia—historia（西文）（麥克·史丹福，2003）。除了英文之外，其他國家語文二字均相同，因此，史學家瑞尼（G. J. Renier）才會說：「歷史即是人類社會生活經驗的故事」，勞倫斯·史東也說歷史是關於過去的真实故事，這位宣稱「敘事復興」的史學家認為，敘述指的是按照時間的順序組織材料，以及把主要內容組織成連貫的故事，當然，還要有次要情節。敘述在兩個方面與結構性的歷史不同，一是它的編排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另一是它的焦點是人而不是環境（R. F. Berkhofer, Jr., 2008）。強調「敘事」與「人物」，指出未來歷史學發展的重點。

正如前面一再提及的懷特的論述，歷史事件按照次序排列成一種編年史，再通過「情節安排」獲得某種意義而轉換成「故事」，最後以作者的「風格」進行歷史紀撰，這種過程中，「故事」依然是主角。由於故事的撰寫要用自然

語言（與科學專用的形式語言迥異），使歷史撰述呈現出和詩、小說、戲劇同樣的「語藝模式」（黃進興，2006）。

故事既然是建構出來的語藝模式，情節的安排就如同教學情境一樣，要經過創意的轉化。懷德海（A.N.Whitehead）有一種教育律動說（rhythm of education），認為知識的傳授必須以一種有意義的律動來傳達，浪漫（romance）、精確（precision）、一般化（generalization）是其特性（瓦克和索提斯，1999）。以歷史課程而論，浪漫代表吸引人的興趣，如此才能仔細研讀，求得精確，也唯有對這個學科越精熟，才能類化、宏觀，才能達成一般化的效果。

故事體是所有歷史教學形態中最容易激發學習興趣者，德國文學評論家班雅明（W.Benjamin）認為有一種「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已漸趨消逝，因為科技文明形成的傳播方式改變，使得口語的經驗變得無法傳遞，民間的歷史也因而失去意義（班雅明，1996）。這種類似說書人的角色，在後現代學者眼中，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國族寓言的代表。由於文史學界故事體的盛行，有論者提出「偉大故事」（the great story）的概念，用「大語境」說故事的方式，把或局部或全部的歷史敘述出來，在體裁方面，可以是一個生命傳記、一個具體地點或區域的歷史，或者是一個特殊時代背後的大敘述，在尺度上，偉大的故事可以橫渡大洲，跨越世紀地描繪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興起和擴張（R. F. Berkhofer, Jr., 2008），這種說法有些像逐漸敘事化的年鑑學派，前面提到的《蒙大猶》一書就是很好的例子，勒華拉杜里透過描述十四世紀法國信純潔教派的小村，受羅馬教會宗教審判的檔案，成功敘述還原當時庶民階級內心深層結構的諸般想法與心理現象，讀來絲絲入扣，十分新鮮有趣，該書雖然是學術著作，但一出版即洛陽紙貴；其他如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也以敘事見長，每本歷史著作都是暢銷書，在臺灣幾乎都有譯本。此外，以臺灣電影《賽德克巴萊》為例，與霧社事件相關的論文與專書可說是汗牛充棟，而學界對其相關人物（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花岡二郎）也曾有多次論戰，但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都不能與這次使用電影敘事的方式相比，在提升原住民的歷史地位，使大眾重新認識原民史方面，故事體的電影優於嚴肅的學術論述，由此可見。

對於通識歷史課程，若與故事體連結，可以開設與學校區域相關的區域開發史或史蹟導覽，並以敘事為主要教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即開設過「板橋、新莊地區開發史」、「浮洲地區史蹟導覽與調查」和「板橋林家花園史蹟導覽」；由於敘事與口述史的相關甚大，通識教育中心也開設口述史相關課程，例如「口述史的理論與實務」，並與校史的建置相結合，選修的學生必須為本校藝術家師長作口述史採訪。

故事體影響下所開設的「生命故事」相關課程最值得注意，我們的生活一直都和敘事交織在一起，化成各種故事，有些社會科學家認為人類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成為故事」這件事決定了我們賦予經驗的意義。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人類就要面對一項任務，那就是他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次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一份紀錄，他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連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一份紀錄，這紀錄可稱為自己敘事，這個敘事如果成功，人對生活就會有連續感，覺得生活有意義（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200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曾開設「藝術家的生命故事」課程，就是這種生命敘事想法的實現，這種教學過程，使參與生命敘事的藝術家建立自我的價值，採訪的同學除認識與體會藝術創作歷程外，也有實作口述史的經驗。

二、歷史寫作與傳記

安克斯密特將史學家的工作區分為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則是一種關於歷史寫作的歷史哲學（彭剛，2009），畢竟，敘事史學所關心的重點都與歷史撰述與編纂有關。

前面提及的生命故事，若將之與歷史寫作課程結合，便具有寫作與心理治療的雙重效果。使用「敘事治療」的卡爾·湯姆（K.Tomm）認為：身為人，我們不但因為「說」自己生活的「故事」，而為自己的經驗帶來意義，也因此有力量透過對故事的認識而「實行」自己的故事（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200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在「口述史的理論與實踐」、「臺灣史」的課程中都有加入實作的課程，課堂上讓他們作自己的「生命故事」，當其觸動心靈的創傷處，報告的學生常會激動到無法自己，這種課程最好和心理學教師合開。「臺灣史」課程中可實作「家族史」報告，報告撰寫過程中，學生與家族成員（尤其是常受忽略的年老成員）會建立更緊密的情感聯繫，也會對自己成長的社會環境有更開闊的視野。筆者曾在要求學生作家族史的報告後，接到學生的祖父來電表示感激，他說在此之前他們祖孫之間很少說話，他從鄉下到臺北和兒子生活，從前他在家鄉辛苦所建立的家庭好像全都消失，兒子太忙，孫子很陌生，使他覺得生命沒有意義，現在經由孫子對家族史的訪談，才拉近了祖孫的感情。

海登·懷特一再強調敘事史學必須和「歷史寫作」連成一氣，他認為敘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領，使用自然的語言，只要常練習，不必一定要先知曉理論就能做好。史家崔威廉（Trevelyan）也說：寫作非為次要，而是史家的首要任務（黃進興，2006）。歷史寫作和文學創作相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實踐比

理論更為重要，臺藝大通識教育中心因此設計「口述史工作坊」，結合學程與歷史寫作兩種概念。

除了歷史寫作外，敘事史學也很重視人物，這一點，名歷史學家史東在前面業已提及，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利斯（Sophokles）曾說：人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東西。以人作為歷史撰述的重心一點都不為過，試想，若俾斯麥（Bismarck）死於搖籃，德國將會變成何種景象？歷史會如何演變？此外，歷史人物所產生的「典範作用」也對一般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通識課程，人物傳記相關課程的開設，應該是使一般學生認識歷史最可親性的途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曾開設以中國歷史人物及臺灣歷史人物為主軸的通識歷史課程，學生反應良好，未來將可規劃以各專業類別的歷史人物為課程重點，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

故事體、生命史以及人物傳記在課程設計方面，要遵守史學的標準，注意與文學的區隔，海登·懷特歷史虛構論，不能過度引申，誠然歷史必須通過敘述來再現，難免有虛構的成份，但虛構在歷史敘述中不能成為任意編織，脫離論述的素材，以傳記而論，有堅實可靠史料支持的是「傳記史學」，反之則為「傳記文學」，這是學科的屬性，前者為歷史學，後者為文學，二者不涉及孰重孰輕的問題。

三、多元觀點與跨領域

敘事史學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中復興，因此也受其文本多元的影響，而有多元觀點，而且後現代主義者將歷史論述歸納為話語形式（verbal form），因而有多重觀點，尤其是故事體，不是看到單一意義的世界，而是像透過一組稜鏡，同時間每一稜鏡各自掌握其中的一部分（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2001）。此外，海登·懷特歷史若文學的主張，也幾乎泯滅了歷史與史詩、神話、戲劇、小說的界限，從建設性方面來看，更容易作跨領域的結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曾設計出如「歷史上的女性圖像」、「影像中的中國歷史」、「傳統小說中的中國歷史」等跨領域的歷史課程，就是基於這種想法。而視覺圖像的重視與強調，既是數位時代的潮流，也是後現代主義者反對文字霸權的產物，敘事史學有了視覺圖像的助陣，學習興趣大大提升。

陸、結語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即將知識的類別分成「理論知識」、「實踐知識」、和「創制知識」，數學、物理學這些具有普遍真理的屬「理論知識」，而倫理學、政治學這些具相對真理的屬「實踐知識」

（余紀元，2011；苗力田，1990），這樣看來史學應屬「實踐知識」的範疇，可是近代的科學史學運動，卻將史學導入不同的範疇，使史學為求所謂的精確，而日趨冰冷與枯燥，失去原有溫暖的陶冶作用，其間的關鍵即敘事功能的喪失。

史東認為：新的歷史學家轉向記敘體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科學史學」的白日夢也隨之破滅，敘事的復興是一種「新的舊史學」（徐浩、侯建新，1996）。敘述與故事體的復興不但在史學領域，其影響力已跨越學科，在心理諮商方面，出現了「故事治療」的新學門；建築與史學結合，也出現許多「故事館」，讓老街、老房子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流風所及，甚至影響到商品設計，廣告是故事體，商品陳列說明也是說故事，由此觀之，故事敘述體的出現，事實上是一種思潮下的文化現象，與後現代主義所蘊釀的敘事復興有關。

敘事史學的興起並非意味著分析史學已經死亡，而是提醒學界莫忘敘事在歷史編纂中的優點而已，正如前所提及的史家葛利所言：歷史學家不能偏廢故事，恰似物理科學不可須臾少缺理論（theory），各是兩大學科的解密之鑰。分析史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蘊積，在史料考證、史實辨正方面，仍有其不可動搖的優點，二者的競爭、消長，反而是多元融合的進步現象。以前所提及的《蒙大猷》一書，勒華拉杜里就將敘事發展成解釋的一種形式，以某一問題為中心，成為一種有主題、有論點的敘事，這種趨勢可看出史學界對調和二者所做的努力。

敘事史學的復興對教育研究，將會有深刻的影響，此為筆者深信不疑之處，蓋因「敘事」的本質，將使教育目的的思考，增多人文性的考慮；在教材教法的研究上，也將提高質化研究的地位；在課程設計方面，將更多元並與生活更緊密結合，與杜威（John Dewey）「教育即生活」的哲學主張互相印證。尤其對通識歷史課程（甚至全部的通識課程）都有重大的影響，因為敘事的媒介已超脫文字，史蹟建築、地圖文物、繪畫照片、以及所有的影音資料，都可成為教學的有力工具，在課程設計者、教師與學生三者之間，反而能激發出歷史教學的活潑性來，使非歷史本科的大學生，在探究沉重的歷史論述之餘，也可沾染一些歷史的趣味性，更能貼近生活。帶動敘事復興的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研究有功有過，在好的方面而言，它強調各種視角，意味著沒有一種單一的、完整的歷史，容許多重視角的批評，使更多的話語元素進入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但在壞的方面則是有時無視歷史學家法與技藝，將人們與過去的關聯作武斷而任意的斷裂，使真理和合理性不復存在（彭剛，2009）；把「歷史若文學」、「歷史等於虛構」無限上綱的推衍，反而有過當之處，就好比潑洗澡水把嬰兒一起丟棄，如此一來可能動搖整個歷史學門，如何整合二者，去蕪存菁，已成

為史學界最關心的事；至於如何將其主要精神應用到教學領域，則是未來教育哲學學門，必須面對與重視的課題。

參考文獻

- 史壯柏格 (R.N.Stromberg) 原著；蔡伸章譯 (1995)。近代西方思想史。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 史提夫·羅傑·費雪 (Steven Roger Fisher) 原著，李中文譯 (2013)。閱讀的歷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 瓦克 (D,Walker)、索提斯 (J.F.Soltis) 原著；許瑞雯譯 (1999)。課程與目的。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 余紀元 (2011)。亞里士多德倫理學。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杜維運 (1999)。史學方法論。臺北市：三民書局。
- 苗力田 (1990)。古希臘哲學。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班雅明 (W.Benjamin) 著；馬國明譯 (1996)。說故事的人。寫作雙月刊。香港：曙光圖書公司。
- 徐浩、侯見新 (1996)。當代西方史學流派。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海登·懷特 (H,White) 原著；陳新譯 (2004)。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市：譯林出版社。
- 唐納德·R·凱利 (D.R,Kelley) 原著；陳恆、宋立宏譯 (2003)。多面的歷史：從希羅多德到赫爾德的歷史探詢。北京市：三聯書店。
- 麥克·史丹福 (M.Stanford) 原著；劉世安譯 (2003)。歷史研究導論。臺北市：麥田出版社。
- 麥克·懷特 (M.White)、大衛·艾普斯頓 (D,Epston) 原著；廖世德譯 (2008)。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
- 黃進興 (2006)。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市：三民書局。
- 彭剛 (2009)。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楊豫 (1998)。西洋史學史。臺北市：雲龍出版社。

趙慶河（1995）。**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臺北市：稻禾出版社。

盧波米爾·道勒齊爾（Lubomir Dolezel）。**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迎接後現代主義的挑戰**。戴衛·赫爾曼（D.Herman）主編；馬海良譯（2004）。**新敘事學**。北京市：北大出版社。

羅伯特·F·伯克霍福（Robert F. Berkhofer）原著；邢立軍譯（2008）。**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airiti

The Renaissance of “Narrative History ” and Its Practice in Teaching

Ching-Ho Chao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Abstract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were originally two major elements of historiography.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ans both have a long and good narrative tradition. Narrative history had long seized the historiographical power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histo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19th century, scientism blossomed out and prevailed in the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weakening the interconnection among history, rhetoric, and literature, with its nature to advocate truth and precision so as to eliminate the artistry and literalness in historical writing.

Recently, some thinkers began to voice different ideas, proposing that history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truths (or laws) like natural sciences, because history does not have a certain regular movement like objects; instead, historical trends can be tracked, and history has no final interpretation. Thus, history does not abide by the laws of science, so we cannot apply the notion of determinism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se arguments help promote the re-emphasis of narrative in history academi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narrative, explains how historiography re-emphasizes the superiority of narrative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considers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is shift on mass culture and history teaching to further offer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 narrative, narrative history, analytical history

Email : t0345@ntua.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August 21, 2018; Modified: October 18, 2018